

方立天文集 六 第1卷 二

Fang Litian Wenji Weijin Nanbeichao Fojiao

魏晋南北朝佛教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◎

方立天文集 〔第1卷〕

魏晉南北朝佛教

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方立天文集. 第1卷, 魏晋南北朝佛教/方立天著.
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6
ISBN 7-300-07510-X

I. 方…

II. 方…

III. ①方立天-文集②佛教-人物研究-中国-魏晋南北朝时代

IV. B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0763 号

方立天文集

第1卷 魏晋南北朝佛教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	010-62511239 (出版部)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网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销	新华书店		
印刷	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		
规格	155 mm×235 mm 16开本	版次	2006年10月第1版
印张	29.5 插页3	印次	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字数	420 000	定价	298.00元 (共6卷)
		本卷定价	4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自序

2005年元月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我谈，建议出版《方立天文集》。我顿时想自己与人大出版社真是缘分殊胜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该社就出版了我的《慧远及其佛学》和《佛教哲学》，2002年又出版了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，其中后两部著作还获得了奖励；如今又要出版我的文集，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！

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，我确定了两个选文的标尺：一是以专著为主，兼及相关论文，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因列入“中国文库”已于近期出版则不再收入；二是以佛教和哲学两个专业领域为基本范围，

佛教以中国佛教为重点，哲学也以中国哲学为主，至于涉及一般文化和宗教的论文，以及序文、书评、笔谈、感言、治学漫述，以及一些杂忆、纪念和悼念的文章，均不收入。

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六卷本文集，第一卷《魏晋南北朝佛教》，以《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》和《慧远及其佛学》两书为基础，再适当增加相关论文而成。第二卷《隋唐佛教》，以《法藏》、《华严金狮子章校释》和《华严金狮子章今译》三书为主，删去其中重复部分，另结集有关隋唐时期佛教论文而成。第三卷《中国佛教文化》，以专著《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》为主，再增辑论述佛教文化的相关论文。第四卷《佛教哲学》，以《佛教哲学（增订本）》为主，另行增加论述佛教人生哲学的论文。第五卷《中国古代哲学（上）》为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》前九章，即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部分。第六卷《中国古代哲学（下）》，除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》的后三章认识论部分外，再收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部分论文而成。编辑同志和我本人在编订过程中，对于发现的疏漏和错别字作了改正，对于有的叙述还作了个别文字的调整。

六卷本文集，是笔者个人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，体现了笔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，也反映了笔者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。

回首昔日的人生历程，一直生活在社会不断大变革的不平凡岁月里，深感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演变密切相连，个人的学术活动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

在以往的个人经历中，有三次重大转折对人生道路影响很大。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使我得以较早地投身革命，经受革命锻炼。二是1956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，在学校期间我对中国哲学史兴趣最大，五年的学习，除了本系的课程，我还听了历史系的通史课程，自学了一些中国文学知识，这为我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。三是1961年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，在一次讨论研究工作重点的分工会议上，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重点研究对象，也就是以中国固有哲学和佛教

作为今后的专业研究方向，我自己戏称之为“双耕”。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构成我的学术事业、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。

我在研究中最着意的，一是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，探究佛教哲学是怎样调整内容，怎样中国化的，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、演变、发展的轨迹；二是总结佛教哲学对中国固有哲学的刺激、推动和影响，彰显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，进而有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，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。

为了研究佛教及其哲学，我的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：中国佛教思想家、哲学家的个案研究；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、校点、注释和今译；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；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；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。这些研究取得的相应成果，构成为文集的重要内容。

阐扬中国哲学智慧，是我的一大志愿。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研究，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，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，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。我把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》（上下卷）和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（上下卷）视为姊妹篇，包含了追求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良性互动的初衷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，文化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。在“双耕”的基础上，我稍稍扩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。在中华文化的研究方面，我强调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；价值观念，尤其是人生理想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；人本主义、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是中国儒、道、佛三家的文化传统，也即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；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。在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，我比较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，并对中国宗教观展开了初步研究，撰写了《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》[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，2005（4）]，归纳、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。最近几年，我对儒、道、佛三教关系的研究兴趣极浓，但因杂事繁多，研究进度有失期待。

我自幼年踏进故乡小学门坎，后进初级中学，再入干部学校、北京大学，最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，没有离开过校门。在弹指五十多年来的治学生涯中，也有一些心得体会，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。诸如：

(1) 树立志向。我根据自身的条件，确定以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志业。治学贵在立言，重在创新，即要在学术上作出新贡献。治学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，从事人文科学工作关乎人的精神世界构建问题，更需要适应时代要求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，肩负起历史使命。为此我要求自己有一份良知和真诚，以回报祖国、人民对自己成长的培育之恩。

(2) 不畏困难。如，佛学自古号称难治，要求具备较多学科的知识 and 相应的条件，而且有时舆论气氛不好，成果发表也受到一定限制，但我认为事情有它的另一面，正是因为研究有难度和不利条件，研究才会更有意义，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更大。我的佛教论著可以说就是排除和克服困难的一些成果。

(3) 勤奋不息。治学不仅要不畏困难，而且还要勤奋努力，有恒心，有毅力，甘于寂寞，耐于坐冷板凳。《荀子·劝学》云：“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”只有常勤精进，百倍用功，才能天道酬勤，有所创获。

(4) 好学深思。要步入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殿堂，研读有关古典著作是基础性的环节，为此我要求自己虚心体会并反复琢磨古典著作探索宇宙奥秘、人生真谛的苦心深虑，以理解其内在意蕴，力避望文生义、生吞活剥。司马迁说的“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”，是我治学的座右铭。

(5) 独立思考。独立思考是治学的生命。学术创新离不开独立思考，学术创新也离不开实事求是，而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实事求是，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独立思考，两者相辅相成。我每当反思以往学术生涯时，深感有时因画地为牢，作茧自缚，而给自己带来窒息思维、桎梏思想的困境，影响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开展，这种深刻教训是值得自己永远记取的。

以上所述编订文集的缘起、文集的要目以及学术道路，意在与读者交流沟通，聊供读者参考而已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，组织高素质的人力投入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。我要感谢李艳辉、杨宗元、王磊、郭晓明、吴冰华、田淑香和符爱霞同志，他们在审读、编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细致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们的热情关注和辛勤劳动，保证了文集的顺利出版，他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高尚品格，令我铭诸肺腑，一并深致谢忱。

2006年6月8日

于京西时雨园

目 录

道安评传 / 1

- 一、东汉以来佛教思想发展的概貌和道安的生平 / 1
- 二、道安的禅法思想 / 7
- 三、道安的般若思想 / 10
- 四、道安的本无思想实质上是玄学贵无思想的变相 / 16
- 五、道安佛教思想的社会作用 / 22
- 六、结束语 / 24



支遁的佛教思想 / 27

- 一、名僧和名士两重人格的融合 / 27
- 二、即色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/ 29
- 三、逍遥论的神秘主义人生观 / 39
- 四、西方天国的宗教归宿 / 44
- 五、支遁思想的历史特点及其影响 / 46

慧远及其佛学 / 49

引 言 / 51

- 第一章 慧远生活的历史时代 / 53
- 第二章 慧远的生平活动 / 62
- 第三章 慧远的法性本体论 / 76
- 第四章 慧远的形尽神不灭思想 / 89
- 第五章 慧远的因果报应说 / 105
- 第六章 慧远的弥陀净土信仰 / 128
- 第七章 慧远的念佛三昧方法 / 138
- 第八章 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 / 153
- 第九章 慧远的佛儒合明论 / 167
- 第十章 慧远佛教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/ 172
- 附 录 慧远年谱 / 178
- 后 记 / 193

慧远的政教离即论 / 195

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/ 207

- 一、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 / 208
- 二、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 / 209
- 三、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 / 210
- 四、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 / 211
- 五、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 / 213
- 六、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 / 214

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 / 217

一、东晋南朝时佛教的发展趋势和竺道生的生平 / 218

二、把般若实相学和佛身说结合起来 / 222

三、宣扬涅槃佛性说 / 228

四、鼓吹顿悟成佛说 / 239

五、竺道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/ 245

僧肇评传 / 249

一、僧肇的生平和著作 / 249

二、僧肇的“不真空”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 / 254

三、僧肇的“物不迁”的诡辩论运动观 / 268

四、僧肇的“般若无知”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/ 277

五、僧肇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/ 287

僧肇的形而上学 / 289

《不真空论》和《物不迁论》导读 / 295

一、不真空论 / 295

二、物不迁论 / 303

梁武帝萧衍与佛教 / 309

一、梁武帝萧衍的生平及其对佛教的提倡 / 310

二、三教同源说 / 316

三、真神佛性论 / 323

四、梁武帝倡导佛教的主客观原因和悲剧性后果 / 331

菩提达摩禅法略论 / 339

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 / 345

一、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 / 346

二、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特点 / 354

三、几点初步的看法 / 358

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 / 361

一、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 / 362

二、魏晋佛学的流传和嬗变 / 366

三、魏晋佛学和玄学的异同 / 376

弥勒信仰在中国 / 381

一、弥勒信仰兴起的三个原因 / 381

二、弥勒信仰演变的三个阶段 / 386

三、弥勒信仰的三个特点 / 400

弥陀净土理念：净土宗与其他重要宗派终极信仰的共同基础 / 403

一、净土宗的创立 / 403

二、净土宗思想的特质 / 405

三、弥陀净土理念是中国佛教终极关怀的共同基础 / 407

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/ 409

引言 / 409

一、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/ 410

二、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方式 / 422

三、佛教中国化的特点和规律 / 428

试论中国佛教之特点 / 431

一、中国佛教特点产生的根源 / 432

二、中国佛教的三大特点 / 439

道安评传

道安是我国东晋时期一位博学的佛学家，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，是当时佛教界的领袖。研究和评述道安的生平和佛教哲学思想，对于了解与总结中国古代佛学史和哲学史，都是十分必要的。

一、东汉以来佛教思想发展的概貌和道安的生平

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，起初被看做一种道术、祠祀。它着重宣



扬灵魂轮回说，因而也特别重视内心，主张养生养神，少思寡欲，清净无为，心神明静，以为这样就能无所不通，无所不能，而成为佛。这种佛又被视为我国传统迷信的神。这也是汉代佛教最重要的思潮禅法的基调。此外，佛教还宣传大乘般若学。“般若”，就是所谓最高智慧。这一学说主张个人的智慧与万物的本体“道”相冥合。个人的智慧本来是和“道”相合的，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而相离，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解脱后天的种种限制，真正认识、体证本体，做到明本，这样才能成佛。由此，般若学十分重视智慧理论，并得到后来魏晋时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。

魏晋以后译经逐渐增多，自东汉至东晋共译出佛典近千部；信徒也日益增多，到西晋已有寺庙 180 多所，僧尼 3 700 人（参看《佛祖统记》）。但是直到道安的时候，我国的佛教信徒对印度佛学还是处在生吞活剥和牵强附会的阶段，并没有真正理解和领会。当时译经虽多，但疑问百出，而且翻译没有一定规则，草率粗糙，结果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译而义理未尽，义难通晓，或因注重意译而失其本旨，义多暧昧，还有因原文疏脱而前后矛盾，义不连贯的。为了探索佛教的义理，有人采取“格义”或“合本”的方法，所谓“格义”就是以我国原有的术语、名词、概念和范畴去比附拟配佛经的术语、名词、概念和范畴。“合本”是把不同译本汇编起来，加以对比研究。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对佛学的自由比附与任意发挥有了广泛的可能性。

当时传入我国的佛教“禅学”和“般若”两系的特点是：“禅学”常杂以方术，“般若”多比附老庄。例如，有些禅学经典就以“守一得度”来解释禅，这显然是抄自道教的方术^①。又如对般若思想的理解，“本无”原是魏晋玄学家用来说明本体的范畴，而支谶、支谦和竺佛念在译《般若经》时都把它译作“真如”，这实际上是把道、佛、

^① 道教《太平经》卷 96 记载：“夫一者，……可为孝子，可为忠臣，终老学之，不中止不懈，皆可得度世。”又《太平经钞乙之五》：“守一明之法，长寿之根也。万神可祖（一作御），出光明之门。守一精明之时，若火始生时，急守之勿失。”以上两段文字分别转引自王明编：《太平经合校》，408、16 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0。

本无和本体都视为一样的东西。玄学的“正始”遗风也浸入佛门，许多名僧都“高论适时”，“清谈终日”（参看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），他们既用玄学的道理来解释佛学，又用佛学的道理来发挥玄学。佛学在和玄学的合流中日益扩大了自己的影响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佛教要进一步发展，就一方面要继续翻译印度传来的佛经，以便不断充实内容，要对已译的佛经进行整理，以消除混乱，还要求佛教学者消化和融会佛理，从浩繁的佛经中概括出基本思想，以便使日益增多的信徒易于领会和接受。另一方面要继续和玄学合流，以便不断地扩大影响，同时要逐渐摆脱对玄学的依附，为自身的独立发展开辟道路。道安的宗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就是应此而生的。

道安生于公元312年（西晋怀帝永嘉六年），12岁出家，因为其貌不扬而被轻视，师父令他先从事农业劳动三年。但由于他天资聪颖，记忆力超人，终于得到师父的器重，受戒后任其游学，由此开始了他的僧侣生涯。

道安从事佛教理论和实践活动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
（一）师事佛图澄：佛图澄是当时著名的僧侣，以方术为石勒、石虎的后赵政权服务。后赵迁都于河南的邺（今临漳县西），佛图澄也随之到邺。不久，约公元335年，道安到邺师事佛图澄，“服膺终身”，直至澄死（348年）。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，道安得到佛图澄的赏识，佛图澄讲法，道安复述，这使道安在佛教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。

（二）研习禅学：佛图澄死后，道安因石氏内乱，在河北、山西一带到处避难，其间曾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，徒众数百，弘宣佛法。约在公元364年又迁居南下。道安虽然颠沛流离，山栖木食，处境艰难，但是他斋讲不断，注经甚勤。在这大约15年的时间里，他深受北方佛教重视禅定的影响，主要是研习禅学，对于安世高传来的《阴持入经》、《大十二门经》、《修行道地经》，写序作注，用力很深。对于般若也极留心，曾找到竺法护译的《光赞》的残本一品。

(三) 讲习般若学：公元 365 年，道安到河南一带，因慕容恪进攻河南，形势极度混乱。恰在此时，襄阳大名士习凿齿迎请道安去弘法，于是道安继续南下，率弟子 400 多人到襄阳。在襄阳 15 年，道安由于受南方佛教重视义理的影响，佛教思想发生重要的转变，即从禅数转而趋于性空，集中讲习般若，每年讲两次《放光经》。并且孜孜矻矻，注释《般若》、《道行》、《密迹》和《安般》等经，收集和整理经典、编撰经录，受到朝野的推重。

公元 379 年，前秦苻坚攻克襄阳，为形势所迫，道安和习凿齿拜见苻坚，“既见与语，大悦之，赐遗甚厚……与诸镇书：‘昔晋氏平吴，利在二陆（陆机、陆云）。今破汉南，获士裁一人有半耳’”。（《习凿齿传》，见《晋书》，第 82 卷）一人指道安，半人指习凿齿，因为习脚疾严重，不能行走，所以称为半人。道安在长安（西安）生活七年，至公元 385 年（东晋孝武帝十年）命终。道安晚年继续讲述般若诸经，并组织对小乘一切有部等佛典的传译。

道安虽然身处前秦的长安，但是心向东晋。据《高僧传·释道安传》等史籍记载，他曾巧妙含蓄地谏阻苻坚侵犯东晋。他在中年以后逐渐由北南下，日益接近东晋王朝。

道安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概括地说有两个方面：一是组织翻译、整理和阐述经典，创立以“本无”为宗旨的学派，后来称为“本无宗”（虽号称为“宗”，实际上是学派，和后来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不同）；一是宣法传教和培养弟子。

关于第一方面，首先是注经作序。根据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隋众经目录》和《历代三宝记》的记载，道安的著作大约共有 60 种，其中佚失的约 40 种，现存的约 20 种，涉及般若方等、阿含本缘、毗昙、名相、禅修、律仪等广泛的领域。现存著作有各种经论序 16 篇，其中 15 篇载于《出三藏记集》，一篇为《鼻奈耶经序》，载于《大正藏》^① 第 24 卷《鼻奈耶经》卷首；再是注疏一种，《人本欲生经注》

^① 《大正藏》，日本东京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，昭和 54 年（1979）。本书所引《大正藏》均同此版本。